

带血的国耻日

——“九·一八”枪声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弯月挂起，长空欲坠，疏星点点。

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上，晃动着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他们是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二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和7名士兵，正以巡察南满铁路为名，一边观察着东北军北大营的动静，一边沿铁路线由北向南走来。在距离北大营约800米的地方，他们停了下来。只见河本蹲下身，把一小包方形炸药安放在东侧单轨两根路轨接头处，然后迅速地离开了路基。晚10点20分左右，河本点燃了导火线，只听“轰”的一声闷雷似的爆炸，路轨被炸开了一个1.5米长的缺口。爆炸声过后，隐藏在距爆炸点4公里以外文官屯南侧的日军川岛中队长立即率领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向北大营发起了冲击。接着，安放在沈阳南站的日军两门重型榴弹炮的炮弹也射向了北大营和飞机场……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密谋侵略方针，加紧军事部署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绝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一起企图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就制定了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内容的“大陆政策”。1927 年六七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正式确定了以武力攫取整个东北，加速实现“大陆政策”的侵略方针。会后，田中上奏日本天皇，露骨地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①。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掌握满蒙权利，则是日本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大关键。”

为了把满蒙早日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从 1930 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着手秘密策划和制定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

1930 年 11 月，日本参谋本部在第二（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经过反复讨论，草拟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②，决定分三个阶段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第一阶段，“在满蒙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第二阶段，满蒙独立；第三阶段，占领满蒙，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这个《形势判断》经陆军三长官会议通过后上报天皇，1931 年 4 月形成正式文件，向关东军下达，成为日军侵略东北的目标和基本方针。

^① 满蒙，当时指东北南部和蒙古东部。

^② 昭和六年。即公元 1931 年。

为了统一思想，协调行动，1931年6月19日由陆相南次郎批准组织的，以建川美次为首，有5个课长参加的秘密班子，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大纲的核心，是日本对东北“要采取军事行动”，同时“有必要取得国内外的谅解。”“为此，需要预先制定一个周密的工作方案并取得上级批准，以便顺利进行。”“为谋求国内外谅解而采取措施，约以一年为期，即到明年春（1932年）为止。”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已确定在1932年春。所以，这个大纲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的纲领性文件。6月底，陆军省便把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密召回国，向他详细解释了这个大纲的精神实质。关东军的行动，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纲领进行的。

其实，在武装侵占东北的问题上，关东军显得更加急不可耐。早在1929年“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祸首，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副机关长花谷正等人，在关东军司令官的默许下，就已经开始对武力侵占东北的条件，进行了反复深入地研究和策划。他们认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这年7月，石原莞尔起草了一个关东军占领满蒙的计划。9月，关东军司令部兵要地志主任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了《关于满洲占领区统治的研究》，提出要在一两年内占领东北。不仅如此，从1929年7月到1931年7月，板垣和石原还以组织军官旅行为名，先后四次到东北的一些重要军事地区进行实地侦察，搜集情报，研究战术，甚至进行小规模军事演习，为武装进攻东北做准备。1931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根据陆军中央部下达的关于“必须研究占领满洲

的计划”的“训令”，以石原为主谋，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这个方案认为，当时已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第三阶段，即军事占领阶段，主张“以谋略制造关东军行使武力的机会”，要求“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独立决断颠覆张学良政权，占领满蒙。”为了得到陆军中央部的支持，6月底，关东军专门派花谷正回国，向中央部转达了关东军希望在秋天采取军事行动的要求。7月间，关东军针对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又制定了《关于形势判断的意见》，主张第一“要立即动手”不能再等一年；第二“占领满蒙，立即使之领土化”，反对分三个阶段；第三“不能坐等机会偶然发生，要自己动手制造契机”，也就是制造战争借口，以“急速解决满蒙问题”。7月30日，板垣带着这份《意见》回国活动，很快就得到陆军中央部实力人物的理解和支持。8月初，转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建川美次，指示新任作战课长今村均，要他根据《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精神，制定作战计划。在“九·一八”前夕，今村就拟好了作战计划并呈报参谋总长，然后由参谋总长报告给陆相南次郎。

在此之前，1931年4月中旬，日本军部调第二师团到东北换防，并将驻中国的军队由轮换制改为永久制。这个师团的士兵生长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很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在换防中，乘机将大批作战物资从日本运到东北。随后，日本独立守备队也做了调整，将兵力向沈阳一带集中。8月初，日本军部任命曾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驻华武官的“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作为关东军司令官。另一名“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大佐被任命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从而完成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

制定具体计划，寻找事变时机

在得到陆军中央部的支持后，关东军司令部便加紧制定武装侵略东北的具体作战计划。

他们首先选择了首战目标——沈阳。沈阳，当时是全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如果占领了沈阳，就等于控制了东北的中枢。所以，关东军便把沈阳选作武装侵略东北的首战目标。为此，1930年春，石原莞尔和佐久间亮三详细了解了沈阳附近的情况，并派出士兵化装成“满铁”职工，以测量铁路为名，对沈阳北郊东北军北大营附近的每一个军事目标进行测量。他们还对沈阳城墙最脆弱的部位和损坏的地方进行了详细地侦察，选择了攻城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奉天城攻击要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精心策划了柳条湖炸路事件。1930年冬，他们就已经把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确定为实施武力的地点。最初，他们打算在北大营附近的铁道岔口插入铁棍，以颠覆火车，但觉得这样做容易被巡逻兵发现，于是便改为爆炸铁路的办法。到1931年春，具体的行动计划制定完成。按照这个行动计划，关东军将在距离北大营800米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上炸毁一段路轨，然后就说这是东北军所为，只要炸路一成功，就闪电般地出动军队，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并在各国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干预之前，迅速占领预定地区。

为了实施上述计划，关东军参谋部纠集了一批死心塌地的侵华骨干分子，组成了两个秘密班子。一个是爆炸铁路的班子，由独立守备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雄大尉负责爆炸现场指挥；由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的辅佐官今田新太郎大尉负责爆炸铁路的任务；由工兵出身且精通爆破技术

的独立守备二大队第三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具体执行爆炸任务。另一个是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班子，由驻虎石台的川岛正雄大尉、驻沈阳的独立守备二大队第一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二十九联队副小島少佐、第一大队长名仓少佐和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等 5 人组成。板垣和石原向他们说明了“柳条湖炸路计划”。经过几次秘密聚会，任务基本落实，决定炸路成功后，川岛所在的独立守备队就近袭击北大营，小島所在的第二十九联队攻占奉天城。此外，他们还向第二大队副儿島正范少佐和驻抚顺的第二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交了底，并令其随时准备出动。板垣等人还安排预备役大尉甘粕正彦等人，在柳条湖炸路时，立即在满铁沿线各地投掷炸弹，制造事端，然后由驻该地领事出面，以治安不良，保护侨民为借口，请求出兵。并责成他执行“蒙古独立”、“间岛独立”和“北满骚扰”等计划。由驻朝鲜的日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负责联络工作，以便在事变爆发时，争取朝鲜日军的援助。而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将则明确表示，当关东军处于危机之际，驻朝日军决意给予支援。

鉴于沈阳城墙坚固，用中小口径的火炮无法轰开，1930 年底，石原、花谷等人向正在东北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要求给关东军配置重炮。1931 年 7 月，经日本军部批准，关东军将两门口径为 24 厘米的重型榴弹炮从东京军械库提出，分解装箱，从神户用客轮海运大连。旅顺重炮大队的松本大尉亲率 20 名士兵，装扮成中国的搬运工人，以装卸棺材、石碑、洗澡盆为名，把大炮装上火车运到沈阳，直接卸到日本守备第二大队兵营。为了掩人耳目，松本大尉特意选在深夜 12 点到凌晨 3 点之间安装大炮。他们还以打井为名，专门修建了一个 10 米见方的白铁房子，将重炮隐蔽起来。

重炮安装完毕，炮口分别对准北大营和飞机场，随后对炮兵进行训练，对各种目标进行测量和校准，一旦开炮，“即使闭着眼睛也能命中目标。”

为使武装侵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一举成功，盘踞在东北各地的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尤其是沈阳附近的日军演习更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0 年 10 月到 1931 年 7 月，关东军在沈阳附近举行 48 次演习，参加人数达七千多人次。到 1931 年 9 月 2、3 日，关东军几乎整天都在北大营附近的旺官屯、关帝庙、老瓜堡等处进行野外演习。9 月 4、5 日，日军举行包围东北兵工厂和沈阳城的攻击演习。9 月 8 日，日军在沈阳北边门外架起机枪，作攻城演习，并在合堡大街演习巷战，随后又不断地进行城市边沿战、夜战、拂晓战的演习。9 月 14 日到 17 日，日军又在北大营一带连续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演习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17 日的演习中，两名日本警察竟然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气焰十分嚣张。

与此同时，驻朝鲜的日军也有计划地向中朝边境集结，准备从图们江和鸭绿江两个方向越境，策应和支援关东军。他们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在图们江一带越过边境。在中国领土上埋木桩，插小旗，进行架桥、测量等非法活动，并在庆源渡口从朝鲜江岸架设多孔浮桥到中国一侧，多次进行越境演习。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31 年 8 月下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来到东北，在石原等人的陪同下，以视察为名，奔赴各地对其部下进行战前动员。他暗示各级指挥官：必须以最大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如遇与中国军队交战之场合，驻奉天之部队须统一指挥，以发挥其全部战斗力。他说：“目前满蒙之形势。日益不稳，不容有一日之松懈，当突然事

件发生之际，各部队宜断然采取积极之行动，并要有必胜之精神准备”。

选择制造事变的时机。起初，关东军企图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挑起事端，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们便决定在 1931 年秋，即 8、9、10 月间制造柳条湖事件，作为武装进攻东北的借口。因为这时，西方各国正忙于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无暇东顾；苏联也正忙于本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南方与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作战，无力顾及东北。这时，东北的高粱等农作物也将收割完毕，便于作战。所以板垣一伙决定 9 月 28 日实施柳条湖炸路计划。不料 9 月 15 日消息泄露，币原外相在内阁会议上向南次郎陆相提出质问，陆军部一面假装派建川美次赶往东北制止，一面连发密电，通知关东军提前行动。15 日夜，建川乘慢车西下，然后乘联络船经朝鲜前往东北。他故意把 1 天的行程拉长到 3 天，其目的就是要为关东军制造事端挤出时间。板垣和石原接到军部发来的密电后，立即商量对策，经过一阵紧张地密谋，决定提前 10 天，即 9 月 18 日实施柳条湖炸路计划，由板垣坐镇沈阳，负责调动部队，全权指挥；石原到旅顺，协助本庄繁作好全军出动的部署。

9 月 18 日晚 7 时，建川才抵达沈阳。这时板垣等人已经做好了炸路的一切准备。当板垣、花谷正把建川迎到“菊文”高级饭店饮筵时，建川说：“你们的事情暴露了，中央说要停止，但我的意见是，如果能干得好就干，如果不行，以停止为好。”板垣、花谷正见建川没有制止的意思，贼胆更壮，当晚 10 时 20 分，终于演出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自爆南满铁路的闹剧。

一夜之间，占领沈阳

爆炸声响过之后，在现场监督的今田大尉立即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通知了埋伏在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及其他部队。川岛立即率部下同其他日军一起袭击北大营。接着，今田又用电话向坐镇奉天特务机关指挥的板垣和花谷正等人作了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北大营西方铁路被中国正规军破坏。又三四百名中国军队正向柳条沟分遣队攻击前进之中，目下，我巡逻兵正在与中国军队交战。”

板垣接到报告后，立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连发四道命令：（1）令独立守备二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2）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进攻奉天城；（3）令独立守备五大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4）要求第二师团以主力增援之。11时18分，花谷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急电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煞有介事，贼喊捉贼地谎称：“18日午后10时半左右，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两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某部发生冲突。”一个小时后，花谷又发出第一封电报，内称：“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我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个连，现已陆续逃回营房。我虎石台中队于11时许，在与北大营之敌军五六百人作战中，已将该营之一角予以占领而敌仍在不断增加机关枪和步炮我连队目前在苦战中。”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板垣又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了由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的八项电令，主要内容是：第二师团迅速向沈阳集结攻击沈阳步兵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及骑兵第二联队攻击长春附近的中国军队；独立守备队一、五大队向沈阳前进；第三大队迅速占领

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并占领安东；第六大队之两个中队向沈阳集中，归第二师团指挥；要求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速派部队增援进攻沈阳的作战。

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板垣扩大侵华的主动行动大加赞许，对他以代理司令官发布的四项命令予以追认，并把这些命令和以自己名义发布的八项电令一起电告日本军部。19日凌晨3点30分，他率司令部和步兵第三十联队和重炮大队乘火车急速前往沈阳。日本军部接到这些电报后，立即于19日晨7时召开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增兵东北，全力支援关东军的侵略行动。

接到板垣的命令后，关东军独立守备二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立即命令第一中队长小野、第四中队长高桥、第二中队长川上，“率部下全体成员，向北大营之敌攻击前进。”加上已在柳条湖地区的第三中队，第二大队的四个中队已全部出动。

日军在柳条湖炸路时，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正睡在梦乡。由于上级有“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甚避免冲突”的“不抵抗”命令，官兵缺乏迎战准备。因此，当北大营突遭日军攻击时，营区一片混乱。坐镇营区指挥的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旅长王以哲和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报告，请求指示。这时，在沈阳的中国地方当局的最高长官只有荣臻和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他们对日军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日军向北大营发动突然袭击后，臧式毅曾通过电话向日本总领事馆交涉。日本总领事馆却冷冰冰地回答：“军人行动，领事无权限制。”而荣臻接到报告后，却命令第七旅：“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这是张学良传达的蒋介石的命令。午夜

11 时左右，北大营四面枪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日军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房。11 时 30 分，日军迅速突进北大营西北角，攻势更加凌厉。当荣臻用电话询问情况时，再次命令：“不准抵抗”；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于是赵镇藩指挥全旅官兵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向东山嘴子撤退。第七旅的官兵奋起反击，战斗非常激烈。19 日凌晨 2 时许，日军兵力增加，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占营垣。4 时 30 分，日本守备五大队也由铁岭乘火车赶到北大营参战。5 时 30 分，第七旅官兵全部撤出营垣，北大营沦陷。

负责进攻沈阳城的关东军步兵第二十九联队长平田幸弘大佐接到板垣的命令后，马上指挥部队紧急集合，“向奉天城之敌攻击前进。”19 日凌晨 1 时许，联队部就进抵小西边门外，接着兵分三路会攻沈阳。第一路进攻南市场，第二路进攻北市场，第三路进攻大小西边门。驻沈阳的中国军警宪兵数千人，因奉“不许与日军冲突”的命令而未作抵抗，先后被日军缴械。凌晨 2 时，日军进逼大小西关；4 时许，由西南角登墙入城，先后占领了警察署、无线电台，并包围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署、辽宁省政府和东三省官银号。4 时 40 分，日军第二师团主力由辽阳到达沈阳，占领了军政要害机关、兵工厂和航空处。日军发动进攻仅 5 个多小时，到 19 日清晨 6 时 30 分，就完全占领了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枢——沈阳。

日军占领沈阳后，在城内进行疯狂地抢掠和杀戮。东三省的官银号，中国、交通、边业银行以及东北重要官员宅邸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就损失约达 17 亿元以上。东北军的飞机 262 架，各类炮 3091 门，机枪 5864 挺，步、手枪 118206 支，战车 26 辆以及大批弹药、粮

秣、被服全部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日军杀害平民和中国军警约 800 人。19 日中午，日军又占领了东大营和东山嘴子兵营，沈阳地区的东北军撤向锦州。当日日军还占领了安东、营口、长春和凤凰城。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占领沈阳后，又马不停蹄地向东北内地进攻，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 30 多座城市 控制了 12 条铁路线；11 月 19 日攻陷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1932 年 1 月 3 日占领辽宁省临时省政府所在地锦州；2 月 5 日占领哈尔滨。就这样，从柳条湖炸路到哈尔滨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仅用 4 个月零 18 天的时间，就攫取了从山海关到黑龙江之间，相当于三个日本那样大的 13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32 年 3 月，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就任“执政”（1934 年 3 月 1 日“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

至此，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的阴谋计划全部实现，东北开始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黑土地上的人民开始了长达 14 年的“亡国奴”的生活。

屠刀下的暴行

——日寇残杀东北 人民罪行录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以后，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剥削和压迫东北人民，用刺刀维持其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人民稍有不满，便实行疯狂的逮捕和屠杀，在黑土地上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令人发指的惨案。这里记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件。

血洗平顶山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区以南，西露天矿以东，距市区仅 4 公里。此处原是一座小山，因为土质多沙，便于挖掘，所以煤矿便从此处取土填井。天长日久，土山挖平，变成了一块荒地。后来，西露天矿向东延伸，居住在杨柏堡和腰截子两个村子的部分矿工迁居到这里，逐渐形成一个很热闹的村镇。村里开设了钟表铺、当铺和其他饮食服务行业，住有 400 多户人家，2500 多人口，其中大部分是矿工和商贩。由于住宅建筑在被挖平的土山上，故称平顶山村。

1932 年 9 月 15 日是旧历中秋节。这天夜

里 10 时许，辽宁民众自卫军梁希福部袭击抚顺，打死日军 10 余人，焚烧老虎台采炭所的汽油库、无线电台和安全灯房等设施，造成该采炭所停产。遭此打击，驻抚顺的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可是他们慑于民众自卫军的声威，既不敢追击，又找不到自卫军的踪影，便准备向无辜的百姓开刀。由于袭击抚顺的民众自卫军是从平顶山方向来的，于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决定以“通匪”的罪名，血洗平顶山，妄图以此“杀一儆百”并为其被砍死的日军复仇。

9 月 16 日晨 6 时左右，即民众自卫军撤出抚顺还不到两个小时，驻抚顺的日军守备队长川上岸、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参事官山下满男和汉奸于庆极等人便来到小川的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密商血洗平顶山的罪恶计划。经过研究，他们决定，以“昨日大刀队袭击，平顶山居民没有一个受伤，大衙门（当地百姓对抚顺煤矿事务所的称呼）为庆祝大家平安无事，给大家照像留作纪念”为名，把平顶山的居民全部哄骗到平顶山的东坡，然后全部杀光；将居民的财物和房屋全部烧光。一切部署停当，守备队长川上岸便赶往距屠杀现场约 500 米的南侧公路，指挥这场大屠杀。

这天中午，正当平顶山村的居民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大批头戴钢盔，脚穿皮靴，全副武装的日军，分乘 4 辆大卡车，突然杀气腾腾地闯进村来。其中 3 辆卡车上的日军迅速散开，将平顶山村团团包围，不许人们进出；另一辆卡车直接开进平顶山街。日军跳下车后分成若干伙，从村北头到村南头挨门挨户地把居民驱赶出来。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般地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闯进百姓家中，大声咆哮：“快快的，红胡子要来，要打仗，快到南边草坪上给大家照像去！”要丢炸弹，快到南边去躲！”巴格呀路，什么慢慢的有，快快的，快快的！”

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之下，人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被迫从自己家中出来，向村南边的草坪走去。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老弱病残者，走得慢了一点，凶狠的日军不是死命地拖着他们走，就是干脆把他们用枪打死或用刺刀刺死。接着，日军又挨户搜查，翻箱倒柜，唯恐有人漏网。有一个名叫马长顺的小商贩，从自己 7 岁的孩子那里得知日军正在街上杀人，觉得苗头不对，急中生智，用被子包身，率领全家 5 口人躲进屋后厕所的大粪池中，才幸免于难。

不到一个小时，全村人都被赶到大屠杀的现场——平顶山村南端的一块沟形的带有小坡度的草坪地。这里，西面是高约二、三丈的陡壁断崖；北面是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只有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午后一时许，日军从四周把人群集中到草坪的中心。在人群的南面，站着手端刺刀的日军，他们虎视眈眈地死盯着人群。在东面，距离人群五六尺远的地方，放着 6 个用红布盖着的带腿的东西。善良的平顶山人还真以为这是给他们照像的照像机呢！

就在人们一家挨一家地坐在草坪上万分紧张的时候，一个面目黧黑，个头高大的日军军官走出来，用朝鲜话喊道：“腰包，腰包……”随着喊声，有二三十个朝鲜人走了出来。紧接着，带腿的东西上面盖着的红布被揭开了。这时，人们才知道大事不好，高喊：“不好啦！……不是照像机，是机关枪，快跑哇！”然而为时已晚，只见日本军官一挥手，“唬”的喊了一声，突突突……，6 挺机枪由南向北同时疯狂地扫射起来，四面八方的日军也同时向人群开枪。片刻之间，一群人倒下去，血肉横飞。妇孺的哭喊声，中弹者的惨叫声和刽子手的咒骂声连成一片。“冲出去，快逃命啊！”受伤的人叮嘱家里没受伤的人快跑。可是，往哪里跑啊！有人不顾死活地

往西面断崖上爬，然而刚爬几步，便中弹落地。北面除了铁丝网外，还有日军的重兵把守，无法冲出去。东面是日军吐着火舌的机枪，更是无路可逃。只有南面一个缺口，可是几千人挤来挤去，哪能跑得动？特别是一家人围在一起，谁又能忍心丢开受伤的亲人自己逃命呢？结果，谁也没有跑出去，谁也逃不出去，纷纷中弹身亡。其实，狡猾的日军早已在南面的缺口处作了严密的部署，从这里往外逃的人几乎全被打死，只有六七个人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日军把平顶山居民的房子也全都用汽油点着了。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整个平顶山村被大火、浓烟和鲜血所吞没。

6挺机枪疯狂吼叫近一个小时，终于停止了射击，2500多名同胞全部躺在血泊之中，四周寂静无声。法西斯刽子手们没有看出什么动静，以为全都死光了，便一声号令，登上汽车返回市里。3辆汽车已经开走，最后一辆汽车也已启动，这时，他们发现死人堆中有人说话，还有人抬起头来四下观望，准备起身逃走，于是车头一转，重新开回屠杀场。日军全部下车后，从北向南，不管死活，用刺刀进行第二次屠杀。灭绝人性的日寇一边“库啦，库啦”地高喊，一边用刺刀往人身上猛刺。刺到死人身上，没有反应；刺到活人身上，便发出凄厉的惨叫声。有的肠子被挑了出来；有的孕妇肚皮被挑开，没有出世的婴儿被挑出来，甩到半空中。尤其残忍的是，日寇把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呼爹喊娘的孩子用刺刀挑起来，一边哈哈大笑，一边高喊：“小红胡子，往哪爬？”接着往后一甩，可怜的孩子便不知去向。有一位不屈的妇女，当日寇的刺刀刺进她胸膛的时候，她呼地坐了起来，双手紧紧攥住身上的刺刀，凶狠的日寇见此状，一脚把她踢倒在地，并使劲

地拔出刺刀，这个妇女的 10 个手指头立刻被齐刷刷地割落在地上。仇和恨，使她瞪着愤怒的双眼，至死还紧紧盯着刽子手，吓得刽子手呆若木鸡。

大屠杀历时 3 个多小时，到傍晚太阳快要落山时才结束。屠杀场上的尸体黑压压一片，惨不忍睹。有的脑袋崩裂，有的胸膛开花，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身受几十处重伤，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有的还没有断气，在作绝命前的惨叫或低微的呻吟，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了，成了一片血海。阵阵晚风卷着又咸又腥的鲜血味，夹着机枪射击后的硝烟味，四处飘散，其情景分外凄凉。在这场大屠杀中，有 2500 多名同胞惨遭杀害，幸存者总共不过三四十人。经过日寇的烧杀，昔日的平顶山只剩下了一座孤零零的老君庙。

大屠杀的第二天，9 月 17 日，日寇指令一帮朝鲜浪人用大钩子把 2500 多具尸体钩到山崖底下堆起来。其中仍有不少人没有死，有的人还能说话，但是这些人不管中国人是死是活，统统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然后崩塌山崖，借此掩埋烧剩下的尸体。从此，平顶山村在地球上消失了。昔日的平顶山变成了一座人骨堆积的荒山。岁月流逝，风吹雨淋，山崖底下掩埋着的尸骨不时地显露出来，似乎在向人们控拆当年日本侵略者大屠杀的滔天罪行。望着这堆堆白骨，人们悲愤地编出了这样一首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